

城心永续：读懂“古今叠压”的广州样本

□孙英民

立春，万物复苏。在这美好时节，我受邀来到广州，参加由羊城晚报社主办、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越王博物院协办的“城心永续·春启岭南——‘广州’得名1800年城市考古研讨会”，深感荣幸。

广州是一座令人向往的历史文化名城。在中国考古学的宏大版图中，城市考古是最为复杂、信息量最大、也最能产出重大成果的领域。以往，世人目光常聚焦于西安、洛阳、北京、南京、杭州、开封等著名“古都”。与它们相比，广州虽未做过大一统王朝的都城，仅长期作为郡治所在地，但它在城市考古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所展现的“广州样本”，在行业内有着口皆碑。

“城心”的双重含义：是地理格局，更是城市灵魂

何谓“城心永续”？我理解“城心”有双重含义。

第一重是地理概念上的“城心”。从秦汉设郡、番禺为治，两千多年来广州的城市中心始终未移、城址未迁。我们在南越国官署遗址可见秦代的瓦当、南越国的宫殿、南汉的苑囿和东晋的官署等，历史逐层叠压。就在我们脚下，古老的中轴线与现代繁华商圈完美重叠，这放诸世界城市发展史上，亦属罕见。

第二重是精神层面上的“城心”。城市是有生命、有灵魂的。广州的“魂”，源于这两千多年坚守的“城心”，并在此代代相传。广州人生活于此，得以触摸历史的温度，增强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的自豪感。

作为一座典型的“古今叠压型”城市，广州的考古工作难度极大。它不同于那些遗址在荒野、可从容发掘的“荒野型”古城，也不同于西安那种在历史变迁中不断“搬家”、主城址发生偏移的古都。“城心”是“活”的，历史与现实在同一空间维度层层叠加。要在寸土寸金的现代城市核心区进行考古发掘殊为不易。

然而，广州的考古同行们做到了。我们要特别感谢以麦英豪先生为代表的老一

辈考古学家打下的坚实基础，也要感谢张强禄院长等带领的这支新一代队伍。他们常年坚守一线，手持考古小铲，一铲一铲发掘，于钢筋混凝土的森林中，如拼图般将广州的历史面貌拼缀得日渐清晰。从南越国官署遗址，到北京路千年古道，到光明广场下的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凡此种种，勾勒出广州两千年的历史长卷，构建了具有全国示范意义的“广州样本”。

历史证明，每一次重要的考古发现都在为城市叠压文明的厚度、涵养市民的文化自觉，这种对根脉的守护，深刻塑造了城市的品质与气质。

他山之石：从洛阳“中轴线”看城市气质重塑

作为一名在河南文物战线耕耘多年的“老兵”，我深知“古今叠压型”城市考古与保护之艰辛，亦深味其价值。在此，我想分享洛阳的一些经验。

洛阳的隋唐城，同样是一座“古今叠压型”城市。当年的洛阳是重工业基地，遗址之上曾密集覆盖厂房与民居。为了保护、展示隋唐洛阳城的历史风貌，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倾注了难以想象的努力。

这其中包括对大型企业的整体搬迁，比如洛阳玻璃厂；也包括对一些现代公共机构及居民区的协调搬迁。其中艰难可想而知。但也正因这种“舍得”，我们保住了“九州池”这样的皇家官苑遗址；我们发掘了定鼎门、天津桥、应天门等遗址，探明了中轴线上这些关键节点的位置与形制……

20多年持之以恒，洛阳成功地将隋唐城的“中轴线”在考古学意义上重新呈现。从龙门（伊阙）开始，往北望去，定鼎门、天津桥、天枢、应天门、明堂、天堂，直至宫城玄武门，这条中轴线不仅被逐步贯通，更重要的是，它应该是中国目前唯一一条经系统考古发掘、有确凿证据链支撑并保留下来的历史中轴线。

正是这条中轴线，撑起了隋唐洛阳城“前直伊阙，后据邙山，左瀍右涧，洛水贯其

中，以象河汉”的宏阔格局，使其成为中国都城建制史上的巅峰之作。

考古遗址的再现对城市的影响是深刻的。它不仅改变了洛阳的城市面貌，更重塑了这座城市的气质。当历史的轴线重新贯通，城市的文化底蕴便不再仅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成为可感可知、可为之自豪的实体存在。

广州同样拥有一条传承了两千多年的传统中轴线。从越秀山到珠江，这条中轴线见证着广州的生长。我听说，广州也在积极探索中轴线的保护与展示，这非常有必要。

将历史的记忆刻在大地上

考古学延伸了历史的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对于广州这样一座伟大的城市，我对它的考古工作寄予厚望。

当然，在城市建设的洪流中，想要把所有发现的遗址都原址保留下来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我们有智慧、有选择。对此我有一点建议：即便保不下所有的遗址，也请不要让它们默默消失。我建议，在每一个重要考古发现的地点，都留下我们今天考古人的“记载”——它不仅要写在报告里，更要写在大地上。

能不能建一个碑亭？能不能竖一块碑？哪怕只是在一块铺在地上的自然石上刻上几行字，告诉后人：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我们在这挖过什么、发现了什么。这样，当人们走在街头巷尾，看到这些星星点点的“记事碑”，再结合我们考古绘制的“一张图”，就能在脑海中拼出城市的“生生不息”。

“考古前置”的广州模式是成功的，而如何将考古成果转化为城市文化软实力，则是一篇更大的“文章”。希望广州的同行们继续守土有责，用小铲子挖出大历史，让“城心永续”不仅是一个口号，更成为这座城市的一个永恒坐标。

（作者系中国考古学会考古遗产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城市考古与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会长）

在现代城市中寻找古城轴线

——以洛阳与广州城市考古为例

□钱国祥

造就了中国古代著名的隋唐盛世和大一统格局，在都城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甚至远播东亚。日本在营造平城京（奈良）和平安京（京都）时，在制度理念与空间格局上，主要承袭了隋唐都城的形制和面貌，其采用“左京”和“右京”的分区制度，以及平安京“左京”称“洛阳”、“右京”称“长安”的做法，显然是吸收了“中国中原”的“两京”制度。后来，平安京西部（右京）因地势低洼而逐渐衰落，城市重心转向东部高亢地区，故后世京都也就有了“洛阳”“京洛”“洛都”的称谓。

我们数十年来“拼图”式考古工作的一个核心成果，就是在考古学上确认并初步呈现了隋唐洛阳城的南北中轴线。这条轴线的南起天然山阙——伊阙（龙门），向北依次经过定鼎门、天街、天津桥、天枢（文献记载武周时期所立）、端门、应天门、明堂（隋代乾阳殿、唐代乾元殿）、天堂，直至宫城大内北门玄武门，体现出与“象天立宫”观念相关的空间表达。尤为关键的是上述重要节点建筑均有考古实证，由此重新建立了一条由实地证据构成的历史空间链条。

在相关部门的主导与推动下，通过遗址覆罩保护、地面标识及模拟展示等多种方式，这条沉寂于地下的都城轴线，得以在现代城市生活中被重新感知。这并非简单的古建筑重建，而是让确凿的考古学信息转化为了可感知、可解读的文化景观。

广州：在连续层叠中追寻历史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广州，就会发现其城市考古的处境，与隋唐洛阳城有相似性。广州也是一座极为典型的“古今叠压型”城市，两千多年的建城史在同一片土地上持续累积。早期的考古工作同样是零散和点状的，近几十年来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随着北京路“千年古道”等遗址的揭露、南越国官署遗址与木构水闸遗址等的系统发掘，以及近年来一系列配合城市建设的考古新发现，人们手中的“历史拼图”越来越多，广州古城的面貌愈发清晰。

通过这些扎实的考古工作，我们得以在文献记载基础上从实物层面观察广州古城生动的生长轨迹。例如，可清晰“看到”城市南界是如何随珠江河道的演变与冲积扩展而逐渐南推；宋代又如何因应经济发展与军事防卫需要进行了大规模扩城。这些都是被考古一点点证实的历史过程。

关于广州城市中轴线的形成，考古材料为我们提供了时空坐标。

从中国古代都城制度演变的背景来看，都城中明确的“建中立极”轴线观念，一般认为至曹魏洛阳城时期趋于明确，并逐步强化其制度表达，以太极殿为核心确立至尊地位。这一制度历经魏晋南北朝演

广州：一座“生长型”历史文化名城的考古告白

□刘瑞

回望我的考古经历，广州始终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起点。

2000年春节后，我参与了南越国官署遗址的试掘。彼时，中山四路一带仍是广州儿童公园。此前数年，周边已陆续发现南越国官署遗址（如1995年电信局工地水池），而2000年开展的儿童公园内试掘在发掘出南越国一号宫殿东北角的同时，确定在儿童公园内应存有南越国时期高等级建筑。我有幸亲历了这一关键节点。

随着遗存价值的迅速明确，广州市委、市政府作出决策：迁建儿童公园，为南越国遗址的系统发掘与整体保护腾出完整空间。2002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机构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原儿童公园开展持续发掘，先后清理出南越国宫殿、南汉宫殿等岭南历史时期的核心遗迹，揭示出从南越国至清代的层层叠压的广州城市生长的文化地层。

也正是在那次发掘中，一个问题开始在我心中盘桓：两千多年前的宫殿何以仍埋藏于今日城市的核心？广州的政治中心为何始终未曾迁离这片区域？2011年开始，我的工作轨迹转至西安，面对中原地区那些气势恢宏的“荒野型”都城遗址，再回望广州，对比愈发鲜明。

在原址上叠加生命“年轮”

今天，我们经常谈论文明，而在很长时间里世界上公认的“文明”标准是城市、文字与金属器。城市是文明最为具象的容器。而中国的古城大体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我国历朝最重要的都城，如夏的洛阳二里头遗址、商的安阳殷墟遗址、周的宝鸡周原遗址、西安丰镐遗址、秦咸阳、汉长安、洛阳汉魏故城等，都位于今天的郊外农田中，学者称其为“荒野型”遗址。虽在西安、洛阳两地的历代都城，其大体同属一地，但却像一个调皮的孩子总是“跑来跑去”，如西安的周丰镐、秦咸阳、汉长安、隋大兴长安、洛阳的二里头、偃师商城、汉魏洛阳、隋唐洛阳的城市都不在一地，彼此并不完全重叠，最终在现代城市的周边留下可供相对对发掘的遗址。

另一类是以广州为代表的“生长型”城市。广州，从秦汉番禺建城开始，其城市的核心区几乎未发生前述的根本性迁移。它就像一个性格特别“稳”的孩子，执着一地，一砖一瓦地在出生地上叠加着其生命年轮，直至今日，成长为我国南部最重要的现代化都市。因此，若论“城心永续”，广州自然当之无愧。这份“永续”不是文献上的冰冷记载，而是经考古工作者手铲揭示出的鲜活的、一层层压一层的泥与土实据。

在这种城市的核心区做考古，其难度与意义就远非“荒野型”遗址可比。它要求我们在钢筋混凝土地面之下，对历代兴废累积的、深达数米的“文化地层”开展一场场精密的“地下手术”。我们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城市更新与建设项目所带来的发掘契机，是真正的“见缝插针”。

原来的儿童公园、北京路“千年古道”、光明广场、旧仓巷、小马路……正是通过这些分散的、看似偶然的发掘点，可以像拼合一张巨大而复杂的拼图那样，用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逐渐勾勒出这座古城两千多年的生命轮廓。例如，据现有考古材料，我们已可判断，在相当长时间里，广州城市的中心的城址，其西至小马路一带，东达旧仓巷附近，北抵越华路一线，南不过西湖路光明广场的南越水闸。而历代的官署核心更长期执着集中在今北京路北端一带。

权力的投影：“实体轴线”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个核心问题：什么是城市的“轴线”？城市轴线，从不应只是一个单纯的几何或美学设计。我想，城市中轴线的本质，是权力与秩序的空间投影，因此它必须穿过政治的“心脏”，而在政治“心脏”的南方，除一座座的城门外，就再无其他建筑“屏障”阻挡。如已见世界文化遗产的北京中轴线，它在穿过紫禁城太和殿后，向南穿过午门、天安门、中华门、正阳门、永定门；而西安唐长安城的轴线，在穿过太极宫后，向南穿过承天门、朱雀门、明德门，均将都

城一分为二。

那广州城的轴线在哪里呢？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南越国时期已初见官署布局的端倪，而至迟至五代的南汉国时期，在营造“南阙”后，南汉的都城呈现出清晰的南向轴线布局。至宋代乃至明清，这一南北向的空间格局不断延续，“双门底”城门的位置与既有城心结构明显存在空间的对应关系。这就是广州城的历史轴线。

为何在此？因为两千多年来这里始终是广州的政治中枢。从南越王宫、南汉宫殿到明清两代的布政司署，直至民国，岭南地区的行政中枢一直在这里。走在中山路一线，我们可感受到微妙地势起伏：进入古城核心区时地势略有抬升，越过后才趋于平缓。这种高差变化反映了古城选址依托自然台地的地貌特征。所以，讨论广州的轴线必须回到“城心”，回到这条穿越古今“权力中心”的南北脉络上来。

在我看来，这条从历史地层中层层确认的南北脉络，是广州作为“生长型”城市最原初的空间秩序；它与近现代形成的城市中轴线并非替代关系，而是为理解后者提供了更深层的历史锚点。

轴线是空间的骨架，而生命的厚度还需要时间去填充。广州的另一重珍贵在于它拥有一部完整的城市生命周期。南越国时期是这座城市的第一个“高峰”。随着汉武帝平南越，岭南的政治中心一度西移，考古所见的本地高等级墓葬的规模收缩、重要物资减少。然而，广州（时称“番禺”）的城址却并未废弃——它凭借地理之便积蓄力量，等待再次崛起。公元226年，东吴析交州设广州，“广州”作为一级行政区名由此确立，而番禺也从此再回岭南中心。2026年适逢“广州”得名1800周年。

此后千余年来，广州长期作为岭南地区政治与行政中心的地位再无动摇。这样的“生长”曲线，是“荒野型”都城难以保存的珍贵信息，也成就了“生长型”城市考古最动人的章节。因此，广州的城市考古，其价值远不止揭示一座地方城市的历史。它为我们理解世界范围内“持续发展型”历史城市的演变机制，提供了非常难得的中国案例。

同时，这也表明，在这种城市中的文物保护非常困难。“考古前置”制度的落实，正是为了在发展的动态中，为历史遗存留下不可替代的见证。从前辈们的筚路蓝缕，到“先考古，后出让”在法律框架下逐步制度化，广州在国内较早开展了探索，并形成了不断成熟的实践路径。这种制度化的坚持，让南越国官署遗址、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等在闹市中心得到较完整保存，成为市民可感可触的文化地标。

当然，考古不只是为了“保”，也是为了读懂“变”。有人说，拆城墙是破坏。但从长时段的历史维度看，城墙的兴废往往映射着政治格局与城市功能的根本性变迁。《史记》等文献记载，秦统一后曾有“堕坏城郭”的政策记述。而之所以秦始皇下令拆毁城墙，是因为他认为在天下一统后，内部相互之间的防御已无必要。20世纪初广州开始大规模拆除城墙，也是这座城市突破传统军事防御形态、向现代商业都市转型的重要阶段。对当时人而言，阻碍交通的城墙或许已是“无用之物”；而对今人而言，考古的意义不在于评判古人的选择，而在于如实记录每一段变迁的真相。

考古学，延伸着历史的轴线，如果没有历史，走在满是“现代门脸”的街上我们会感到“飘”，找不到根。而没有基于考古的保护展示，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就只能模糊莫辨。当我们走在今天的北京路，脚下有透明玻璃展示唐代路面；南越王博物院，层层叠压的历代遗迹则给人“一步千年”的震撼。考古填补了文明的谱系，更让每个人脚踏大地、心有归处。

“城心”永续需要我们一起守护。它要求在城市更新的每个重大决策中都保有对历史的敬畏与耐心。这是一场“久久为功”的接力，功成不必在我，但功力必不唐捐。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导，兼任中国考古学会建筑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考古所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队长、华南二队队长）

羊城晚报

A5

理论

文史哲

2026年2月13日

星期五

责编 潘玮倩

杨 帅

美编 肖 莎

校对 马曼婷

编者按

2026年，“广州”得名1800年。继“城心永续”第一期专题聚焦在地视角后，第二期的本系列专题接续呈现孙英民、钱国祥、刘瑞三位考古学家的深度思考。他们在历史的长时段与宏阔坐标中，以全国视野，还原广州“城心”两千多年间的坚守与生长。

孙英民阐发“城心”地理不移与精神永续的双重内涵，呼吁将历史记忆深刻于大地，转化为可感可触的文化坐标；钱国祥从丰富的考古实践出发，讲述城市轴线的礼制演变与空间逻辑；刘瑞则将广州界定为“生长型”城市，并从“权力投影”等维度透视其两千多年相续的城市秩序。

“城心”的永续是一场“久久为功”的接力，它提示人们在城市更新的每一个决策中，都保有对历史的敬畏与耐心。功成不必在我，但功力必不唐捐。唯有如此，方能让古城的文明谱系在保护中赓续，让生活于此的每个人，都能脚踏大地而心有归处。

专题策划：温建敏
专题执行：潘玮倩

